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中国服饰与艺术

[法]约瑟夫·布列东 著 赵省伟 编 张冰纨 柴少康 译



出版社
SIAL PRESS

西方汉学经典之作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三 中国服饰与艺术 [法]约瑟夫·布列东 著 赵省伟 编 张冰纨 柴少康 译 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服饰与艺术 / (法) 约瑟夫·布列东著; 赵省伟编;
张冰纨, 柴少康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0. 1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ISBN 978-7-5146-1770-2

I. ①中… II. ①约… ②赵… ③张… ④柴… III.

①服饰—历史—中国 IV. ① TS941.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8916 号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

(法) 约瑟夫·布列东 著 赵省伟 编 张冰纨 柴少康 译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廖晓莹

校 审：任 凯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8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 开 (787mm×1092mm)

印 张：20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770-2

定 价：128.00 元

○约瑟夫·布列东（Joseph Breton, 1777—1852）

1777年出生于巴黎，年轻时师从法国速记学家西奥多·皮埃尔·伯丁。1815年起担任议会速记员，直到去世。他参与创办了《司法报》《分庭速记员》《箴言报》等报纸。布列东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并翻译和主持出版多部著作。1811年，他以亨利·伯丁搜集的众多中国主题彩色画为基础，补充大量文字资料，整理出版了《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

○赵省伟

“西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自2011年起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

○张冰纨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美术史。曾参与文化部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美术经典丛书》，其文章被收录于《翰墨流芳——近现代中国画精选》。

○柴少康

2010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法语专业，2013年获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语言教育工作。

法国国务秘书亨利·伯丁推崇中国技术，热爱中国文化，生前收集了大量中国主题的图文资料，其中仅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原创版画就有400幅。后来，这些资料辗转至约瑟夫·布列东之手。经过其整理及补充说明之后，《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于1811年出版。

全书共分六卷，前四卷译自1813年的英文版，后两卷译自1812年的法文版。共收录100余幅版画，17万字。插画中的人物上自皇亲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绘画手法结合了西洋和中国画法，真实生动，颇具特色。其中，反映手工业、制造业及服饰的部分插图尤为珍贵。本书一经出版，很快便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且多次再版。虽然原作已经出版200余年，但本书仍然是中国服饰和风俗研究的必读书目。

出版说明

虽然已经出版二百多年,《中国服饰与艺术》仍然是研究中国服饰和风俗的必读经典书目。插画(版画)中的人物上至皇亲贵胄,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绘画手法结合了西洋和中国画法,真实生动,颇具特色。尤其是反映手工业、制造业及服饰的部分插图,非常珍贵。希望这本书能给研究相关课题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参考。

一、原书共有六卷,首版于1811年(法文)。本书前四卷译自1813年的英文版,后两卷译自1812年的法文版,其中仅第六卷为黑白版画,其余均为彩色版画。

二、原书有100幅全页插图、8幅折页插图,共108幅版画。本书缺少其中1幅全页插图、2幅折页插图,期待后续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三、为尽量保存书籍原貌,编排时章节顺序均依照原书,未作改动。

四、由于能力有限,书中个别人名、书名无法查出,采用音译并注明原文。

五、由于原作者所处立场、思考方式与观察角度不同,书中很多事实和观点跟我们的认识有一定出入,有部分是错误的,为保留原书风貌,均未作删改。这并不代表我们赞同他们的观点,相信读者能够自行鉴别。

六、由于时间仓促,统筹出版过程中不免出现疏漏、错讹,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9年3月

法国“部长”是个“中国迷”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两名北京青年孔和杨来到巴黎耶稣会修道院学习。1763年，法国耶稣会解散后，急盼回国的两人得到法国国务秘书亨利·伯丁（Henri Bertin）的帮助，并答应回国后帮助伯丁搜集中国的资料。伯丁并没有立即安排两人回国，而是通过政府基金让两人学习了自然哲学、化学、雕塑、绘画等，还让两人游历参观了里昂等地的手工业作坊。游学一年后，两人才被安排躲在一艘中国澳门的船上，借着夜色换装回到了北京。之后两人与北京传教士合作为伯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巨著”之一的《中国杂纂》（又名《中国丛刊》）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编成。

接着法国便爆发了大革命，伯丁历尽艰辛保住了手中的资料——其中仅关于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原创版画就有400幅，而且多数还未来得及在《中国杂纂》上出版。后来，速记员约瑟夫·布列东（Joseph Breton）偶然得到了这批资料。在整理添加说明后，1811年闻名遐迩的《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1]出版了。很遗憾，孔和杨的更多信息尚待挖掘，下面仅对伯丁和布列东作简要介绍，期待方家补充指正。

亨利·伯丁，1720年3月24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城市佩里格；1792年9月16日逝世于比利时列日省东部阿登地区的小镇斯帕。1741年，他来到波尔多，成为一名律师。1757年至1759年，担任巴黎警察局副局长一职。1759年，他接受路易十五的任命，出任财政总监，不过他与国王约定，一旦法国恢复和平，他就辞职。为了更好地调整税收，他建立了新的土地登记制度，却遭到巴黎议会的激烈反对。1763年12月14日，他辞去财政总监一职，转任国务秘书，负责管理包括东印度公司、棉纺织、畜牧学校、采矿、出租车、彩票、内陆水运在内的多项业务。

作为法国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这位法国皇家农业协会成员不单是农业改革的设计师之一，还创建了里昂兽医学院。他坚信中国农业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委托旅行者和传教士搜集资料，这才有了帮助北京青年孔和杨，以及资助晁俊秀和钱德明神父到访中国等故事。1766年至1792年，他与北堂的传教士书信来往密切。他将问卷寄给北堂的钱德明等人，钱德明等人则将翻译的中国资料、撰写的报道、收集的植物种子及各种标本寄回给伯丁。

[1] 19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服饰的经典著作。国内已出版了其中两本：《西洋镜：中国衣冠举止图解》（亚历山大著）、《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习俗图鉴》（梅森著）。第三本就是布列东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编者注

问卷涵盖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各省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牲畜的繁殖、粮食的存储、收成的分配，到农民的地位和土地的获取等。1766年，他还专门向传教士请教了关于中国的储备经济、粮食贸易和价格等问题。收到报告后，伯丁仔细阅读，亲自参与修订，并把选定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杂纂》上。^[1]

伯丁还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他家中设有“中国室”，专门陈列中国的珍宝及标本。据说，他曾一次就得到两大箱来自中国的泥人和纸人，共计31个。^[2]

约瑟夫·布列东，1777年11月16日出生于巴黎，老家是法国东部的穆松桥镇。他年轻时师从法国速记学家西奥多·皮埃尔·伯丁，曾与人一起用速记法记录法国师范学院三年级的课程，还记录了拉格朗日^[3]、贝托莱^[4]、布鲁塞^[5]等名家的授课内容。他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速记队伍，从1792年起负责记录国民立法议会的每场辩论，如格拉克斯·巴贝夫^[6]诉讼案。从1815年起，他一直担任议会速记员，直到1852年去世。他主持组建的速记员队伍（一般有十几名负责人）一直延续至今，极大地保障了议会辩论的民主和透明。

他还参与创办了《司法报》、《分庭速记员》（*Le Sténographe des Chambres*）、《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并从1815年开始到1852年逝世一直效力于《辩论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此外，他在《法国公报》（*La Gazette de France*）、《总公报》（*Le Journal Général*）和《巴黎日报》（*Le Journal de Paris*）上也十分活跃。

布列东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曾翻译过多部著作，包括贝尔萨扎尔·阿克^[7]关于风俗习惯的著作。在法庭上，他负责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口译工作。

编者

2019年3月

[1] 王廉明：《北京耶稣会北堂和中国植物图像——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的一则轶事》，载《紫禁城》，2018年10月15日。——编者注

[2] 罗芘：《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编者注

[3] Joseph-Louis Lagrange (1736—1813)，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编者注

[4] Claude-Louis Berthollet (1748—1822)，法国著名医学家、化学家。——编者注

[5] François Joseph Victor Broussais (1772—1838)，法国著名外科医学家。——编者注

[6] Gracchus Babeuf (1760—1797)，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者，因反对督政府统治而被处死。——编者注

[7] Belsazar Hacquet (1739—1815)，法国博物学家。——编者注

原序一^[1]

目前，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很少有详细介绍清朝艺术品和手工业的图书。古代的传教士和叙写马戛尔尼伯爵使团见闻的英国作家，其作品都只局限于陶瓷、茶叶、印刷业、丝织品等，而且内容大多雷同。英国的旅行家几乎没有新的资料，只能从杜赫德^[2]的著作中摘抄一些片段。

作为前两届政府的国务秘书，伯丁先生深知全面了解中国，对本国的艺术、科学和制造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不惜重金购藏中国稀世珍品，还想方设法地了解这些珍品和画作的详细情况。他在华时，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庇护了很多身在北京的传教士，向他们发放政府补给，改善他们的处境。

伯丁先生极具政治眼光。他不想将这些重要的文档尘封藏于自己的私人收藏室，而希望将它们展现给世人。他很清楚，虽然因为宗教热情而备受尊敬的传教士深谙历史、哲学和数学，但并不擅长深度挖掘艺术和手工业的细节，而他们搜集到的一些重要信息往往不全面也不完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传教士内心并不重视，另一方面是那些被迫提供信息的人不愿透露更多细节。再者，中国手工业者也不会轻易把各自行当里的秘诀泄漏给外国人。

传教士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时出现了一个绝佳的契机——两个新加入基督教的中国年轻人——孔和杨。他俩都是北京本地人，非常聪明，也非常活跃，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他们希望传教士能资助他们去法国“瞻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欧洲基督徒的辉煌。为了去法国，他们在耶稣会的指导下学习了拉丁语和法语。

1760年，这两位年轻人作为初学修士来到巴黎，进入耶稣会的修道院。他们在回忆录中写道：“耶稣会解散后，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只是对法国一无所知，无人照拂。”佛罗伦汀（St. Florentine）伯爵同情他们的处境，帮他们争取了750里弗^[3]的补助金。

急切盼望回到中国的孔和杨，不得不与伯丁先生合作。而负责东印度公司事务的伯丁先生，也迫切希望通过他们二人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让这两个中国人在法国

[1] 1813年英文版前四卷序言。——编者注

[2] 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耶稣会传教士，所著《中华帝国全志》被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之一”及“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译者注

[3] 1781年至1794年间法兰西王国及其前身西法兰克王国的本位币单位。1795年法郎正式代替里弗成为本位币。——译者注

多待了一年。在此期间，孔和杨在法国政府资助下学习了自然哲学和化学，跟从大学教师布里森（Brisson）学习了绘画和雕塑，还留下了一些雕塑作品。教授他们的布里森同时也是基督会的成员，于数年后去世。

按照计划，孔和杨还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到里昂、福雷^[1]和维瓦赖^[2]进行考察，深入了解了法国的手工业，增强了他们交流两国情况的能力。孔和杨对法国的语言和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而在研究时能有效地避免民族偏见。伯丁先生非常希望孔和杨能辅助自己，他很难遇到比孔和杨更合适的中国人了。

最终，孔和杨安全地回到了中国。他们藏在中国澳门船只的角落里躲过了搜查，在一个明亮的夜晚登岸，换上中国的服装回到了北京，就像没有离开过一样。

孔和杨一直对伯丁先生心存感激。作为回报，他们回国后与北京传教士合作，向伯丁先生提供了大量资料。《中国杂纂》就是根据这些资料编成的，但可惜的是，只出版到了第一卷的第15册。这套由韩国英神父以孔的名义写成的《中国杂纂》，由钱德明和韩国英主编，内容非常丰富，中国的起源、语言和历史等均有涉及。

孔和杨还希望能够修订或重写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杨在1772年10月10日写给伯丁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能及时告诉您一些情况，让您能够以一种更加清晰、独特的视角来了解中国。迄今为止，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是隔着一层面纱来认识中国的。这层面纱使他们眼中的中国模糊不清，很多方面都带着幻想的成分。您一直致力于向法国人展现最有价值的中国文化，可是传教士们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很可能会误解您的苦心。不久您就会发现，即使是最优秀的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也存在美化的成分，甚至是凭空幻想。连我心中最优秀的杜赫德神父也擅长此道，在他笔下，那些对象都被严重美化了。我曾经期待传教士中能有一些实事求是的人来纠正之前作者的工作。我之所以这么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赞美时过分拔高，批评时又过分贬低。

这封信的原件在我手里，写在用竹子制成的纸上，字体相当漂亮，很有渲染力。这两名中国人的信件一向如此。在另一封书信中，杨很愉快地向他的保护人介绍了一种在中国很有名的灌木——玉兰。他说：“我希望您能同意我们以您的名字伯丁来为玉兰命名，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1] 位于法国南部的瓦尔省。——译者注

[2] 省名，故地在今法国阿尔代什省。——译者注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信上还有伯丁先生的亲笔评论：“他所言‘伯丁花’是什么意思？它以前不知名吗？不是已经有了‘玉兰’这个名字吗？”

后来，相继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先是北京的传教士中出现纠纷，而后更不幸的是韩国英神父于1780年8月8日去世，我们不得不停止这项对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都很有价值的资料搜集工作。我保存的韩国英神父写于去世5天前的一封信，虽然字迹很陌生，但是有他的亲笔签名。信中写道：

我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但我依然谨记我们伟大的使命。我再次拜托您，您的支持非常重要。为此您已经付出了很多，您做得也很完美，真的很完美。我恳求您将这项伟大的工作继续下去。时间紧迫，如果您不尽快帮助这些法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和他们的信仰一起消亡。

葬礼结束后，一方面，意大利神父安德义^[1]把韩国英神父的两个同胞和四个中国信徒赶出了教会，另一方面，法国的革命也让北京传教士们的处境艰难起来。他们不仅失去了援助，也跟法国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伯丁先生小心保管着他陈列室里那些用于《中国杂纂》的材料及迄今为止未被公开的材料。^[2]其中最有趣的，是一大批描绘中国手工艺和制造业的原创绘画。这些画约有400幅，都是在北京绘制的。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内容的画作。

我偶然得到了这些资料，连同传教士们之间的通信及孔和杨的信件。资料中的很多内容在法国属于新领域，迄今为止还不为人知，尤其是利用猴子采集茶叶、清漆的制作、回族女性的服饰、狡猾的商人、货币兑换商、蒸馏器、铜匠、卖鞭子和风筝的人、中国房屋的内部、卖糖兔的商贩、一些惩戒场景等。

遗憾的是，这些绘画要么缺少文字描述，要么说明过于简略。我补充了一些文字，希望能增加它的可读性。另外，由于很多主题不太有趣，有些画中的服饰与我们欧洲工匠所制的看起来相差无几，所以我筛选出了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题材。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完整著作，来介绍奇特、稀有或实用的中国物品。本书的注释参考了古代和现代的很多文献典籍，包括最早描述绣球、由基歇尔神父编著的《中国图说》，以及1809年由科策布（Kotzebue）出版、伊万·伊万诺夫·查尔准（Iwan Iwanow Tschudrin）编写的《航海片段》（*The Fragments of the Voyage*）。

[1] 1762年来到中国，供奉内廷。与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合称“四洋画家”。——译者注

[2] 这两个中国人的航海记述只印刷了20份。

本书力求简洁、合理、客观，既没有传教士的过度夸张，也没有过分的批评和贬低。英国旅行作家约翰·巴罗至今仍然深受这种写作精神的影响，因此他能更巧妙地描绘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智慧和博学，并将中国人的古今风俗习惯相互参照比较，很少有作家能与他相媲美。^[1]

我非常尊敬传教士，但他们的传教事业不大可能成为有争论的话题，因为那时的英国人多忙于在非洲、美洲和印度传教。至少在这段时期，没人和他们竞争。

英国的传教士们信奉路德教，他们在开启民智方面比天主教会的作用要小得多。我指的并不是外在的形式或教条，而是神父的家庭生活、行为举止和思想性格。

新教的传教士们无疑不会随身带着欧洲女性，但是他们会在中国结婚，并让妻子学习欧洲的礼仪习俗，中国人认为这种变革是一种冒犯。

被日本所接受的荷兰人，跟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同^[2]，还没有收回葡萄牙人在耶稣教会帮助下获得的权势。英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商贸活动也很明显。他们的传教士只不过被当作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整日受到无情的敲诈和持续的羞辱。

如果采用黑白印刷，服饰的插图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本书中的插图都以特殊方式进行刻印。

为了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我结合多位旅行者的素材，依据真实可靠的信息，将不同的材料进行整合，最终完成了本书的编纂，并在书中阐述了一些个人观点。

[1] 格鲁贤在《帝国杂志》(*Journal de l' Empire*)上严厉批评了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我必须坦诚地承认，对他最严厉的指控之一——印刷错误，也许因此转移到了他的译者身上。有人指责约翰·巴罗诽谤中国政府，但因此认定他有愧于传教士们，这就不公平了。

[2] 见《阿瓦岛（南太平洋岛）的文化与军事概况》（第二版），第266页。

原序二^[1]

两年前，我出版了这部关于中国服饰与艺术的著作。前四卷出版后，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和编辑的预料。然而当时我收集到的材料有限，不足以完成整套丛书。基于种种原因，出版社能提供的材料非常少，伯丁先生和中国传教士的往来信件数量繁多且混乱无序，不仅已出版的《中国杂纂》中的很多信件尚待整理，而且还有大量未出版的信件。

后来，内普弗（Nepveu）先生将钱德明神父、韩国英神父和其他传教士的原始信件交给了我。这些信件包含了大量全新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比如苗族的原始风俗、回族的不同部落、满族的游牧族群，以及乾隆皇帝发动的征讨这些民族的战争细节。夏尔·巴特^[2]神父和一些学者受伯丁先生委托撰写《中国杂纂》时，为了不连累北京的传教士，删除了其中的很多内容。如今，这些资料可以完全公开了。

我们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改编整部书，出版一部上下两大册的新版《中国服饰与艺术》。但是出版社非常谨慎，力求避免重复，否则我们的第一批读者只能拥有一部残缺的半成品，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遗憾和不公平的，而正是他们保证了这套书的成功。所以，除了依据我的个人研究和部分读者建议而做出一些修正外，我们将原文重印《中国服饰与艺术》。此外，我们还从传教士寄回的信件和画册中挑选了一些新的绘画和文章资料。

《中国服饰与艺术》第五卷和第六卷名为“中国缩影”。考虑到一些读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前四卷，因此其他卷册也以此命名。我期望完成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向大众展现中国独特的历史风俗，即使是读过马戛尔尼、约翰·巴罗或者德金先生大作的读者，也能从此书中得到新的收获。

正如原序一所言，两个名为孔和杨的中国年轻传教士，从欧洲游历回国后和时任国务秘书及法属东印度公司督察的伯丁先生一直保持通信，即使伯丁先生退休也没有中断，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伯丁先生去世才结束。

我想，没人会质疑这两个中国人在法国的旅行及他们转交给其保护人伯丁先生的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一谈到原始文档，我们好像很容易把所有无神论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本书的编辑内普弗先生正是这些文档的持有者，比如这两个中国人居

[1] 1812年法文版后两卷序言。——编者注

[2] L'abbé Batteux (1713—1780)，法国艺术哲学奠基人，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家之一。——译者注

留期间的花费预算清单、他们回广东的船票、杨留在巴黎的一份经过公证的债券管理委托书等。^[1]

书中将向大家呈现这两个中国人写给伯丁先生的信函和他们收到的回复。在这篇序言中我先摘录两段，一段摘自伯丁先生的信，另一段摘自其中一人的回信。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试图通过这两个年轻人实现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可惜并没有完全实现。

伯丁先生说：“我从未怀疑过你们的坚定，也坚信你们对于在法国期间尤其是回国时国王陛下给予的善待心怀感恩。我一直认为你们天生乐观，心地善良。6000 古里^[2]的距离，没有家人的陪伴，还有一连串的新事物，所有对你们来说有趣的事情，都不能让你们忘记这一事实——你们曾多次向我提起——法国是你们的另一个家乡，你们将永远感念国王陛下。我已将你们的感激之情转达给陛下，同时我亦向陛下报告了你们回到北京后按照他的意愿而收集的这些材料及所做的标注。而这正是你们动身回中国之前陛下命我转达给你们的指示。”

我们自以为已经了解中国手工制造业的核心，但下面这封回信会让我们明白我们错得何其离谱。那些特别的工艺并没有多么复杂，甚至还不如一个陌生的同胞神秘。杨在 1766 年 9 月 29 日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法国时，曾以为中国和欧洲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们大错特错了。在中国，从事一种职业的人不能参与另一种职业的事。一个军人插手政府事务，就像一个老百姓居然想去打仗一样，很可能会犯错。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秩序井然，以至人们很少跨出自己的小圈子，也不会问“为什么”。不在工厂工作的人甚至被禁止进入工厂，即使只是参观机器、不发表任何意见都不可以。我们只能通过谈话的方式，才可能从不同角度完成探索任务。

我想说，在中国工厂保守秘密要比在欧洲容易得多。因为我们需要雇用大批工人，这些工人经常换工作，所以我们能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儿获得情报。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因社会分工不明确，雇人做事很少见，所有的事情都由家庭成员自己完成。

我们在《中国服饰与艺术》第四卷中可以了解到，德金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法兰

[1] 我没有采用他们和已故布里森部长的一封特别的通信。布里森部长也是纳瓦尔初中的物理老师。那封信中有一个有趣的误会：这两个外国人听说布里森部长要免费给他们上物理课，但布里森部长却以为他们会付酬劳。他们甚至都不想提前支付布里森部长为他们购置器械的钱。最后伯丁部长结束了这场争议。他热情赞颂了布里森部长，布里森部长也觉得很受用。

[2] 1 古里约合 4 公里。——译者注

西学院院士，竟然掉进了伯丁先生默许的一个圈套。韩国英神父在写一本介绍古代中国的回忆录时没有署名，而这本回忆录颠覆了他的同行特别是钱德明神父的观点。后来这本著作以孔的名义被送给了德金先生，他竟然误以为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能如此学识渊博，可以像欧洲的学者一样抨击最时髦的观念。

在第六卷里，我们还将看到另一个更有意思的误会，这次的“受害者”是谢伯冷（Court de Gébeline）。他收到一份用古汉语书写的文档，兴高采烈地按古埃及象形文字“辨认”了出来，他为此兴奋了好久之后，钱德明神父才揭开这个秘密，给了他这份文档的正确翻译。

我在后两卷添加了一些简短而富有条理的注释文字，还填补了大量的空白，比如一些食品商贩的插图，甚至一些简单的拨浪鼓图片。我尽量增补相关内容，便于读者更清晰流畅地阅读。

我曾在最新的报告中，讨论中国星象学家观测的可信度及这些观测与现代演算的相符程度。这些都有助于确定历史事件的正确日期。如果论述出现误差，只能归咎于我，因为我没找到相关论证的著作，也不确定是否有人曾经使用过具有可信度的论据。这一切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我们猜测农历任意一年发生日食或者月食的时期的比例仅仅是6:1到5:1，当然这种猜测是不准确的^[1]。但是如果考虑到天象循环的周期性或者恒定性，这一比例的准确性就会提高。

最后我要论述另一事实，即传教士之间对于宗教文献的争论。

已故的伯丁先生在给北京传教士们的一本回忆录中试图通过这本书冷却他们传教的激情。这本书是著名的摩拉维亚弟兄会首领哈顿交给他的，讲的是传教士们在两个印度^[2]传播福音，并获得的成功。书中保存着一封信，内容如下：

辛生道夫伯爵以前在德国创立了摩拉维亚弟兄会，此弟兄会在英国建了一座宏伟的学校，我相信辛生道夫伯爵就是在这所学校安度了晚年。哈顿先生作为伦敦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导，是一位极其勇敢的智者。他去年突然想起，给我寄了一些信件的摘要和传教会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他们的队伍极其壮大，让我有点晕头转向。他们可能已经遍布全世界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遍布着为黑人而建立的传教会。教会在整个非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一位君主皈依后，在他庞大的帝国中建立了很多教会。印度、拉布拉多等也是如此。我再打听打听日本和中国有没有他们的教会，如果有也在我意料之中。

我宁愿没收到您上次的信。我把它发给我的一个朋友了，他对这类新事物

[1] 在那些一年发生四次日食的年份，比例会下降到3:1。

[2] 指印度和美洲。——译者注

特别好奇。他给我带来了作品，还跟我唠叨了一个小时他对于这些教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愚蠢的无奈。他们不遵守规则，急功近利。这在我们的教会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中都很普遍。他向我解释了这方面的计划和体系，令我颇为震惊。最后我告诉他，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像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的一个美梦，梦里他的买卖都成了炼金术士追求的金矿石。有一份材料令他兴奋不已，材料上只有我似乎不够分量，于是他要求加上他的想法，我说我很乐意添上。

在第一本书的序言里，我已经表明，新教教会本不应该期盼在中国获得成功。我们确定这个帝国已经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很快我们也不能再学习它的艺术和风俗了，但关注它们又是如此有趣。现在，除了期待清朝政府能回到自由开放的状态之外，请带着感恩的心态，享受虔诚的游历教徒们为我们传回来的材料吧。



农业祭祀典礼

○ 已出版图书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全二册）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

○ 即将出版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英国画报看甲午战争》（全二册）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全二册）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20 世纪初的中国铁路旧影》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笨拙〉画报记录的晚清 1891—1911》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荷兰使团出访中国记》
-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德奥战俘在中国》

责任编辑：廖晓莹
特约编辑：赵开放
封面设计：朗月行
微博搜索：中国画报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zghbchs

目录



01 | 中国服饰与艺术·人物 第一卷

- 002 中国概况——物产和宗教
- 006 乾隆皇帝
- 010 身着夏装的清朝官员和地位显赫的女性
- 013 皇家供水马车
- 014 大臣的轿子
- 016 公主的马车
- 018 身穿官服去上朝的五品官员
- 020 敲梆子守夜巡逻的衙差和在他前面提灯笼的衙差
- 022 前往守卫宫殿大门的八旗军
- 024 坐独轮车的女子
- 025 卖镜子的人
- 026 满族妇女和儿童
- 028 身着盛装的班禅和东北地区的喇嘛
- 030 一位正在烧纸、祭拜门神祈福的满族女性
- 032 一位匍匐苦修的僧人
- 034 圆明园
- 036 一位骑马游街的年轻新科进士